面向 21 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二）

2019 年 4 月 12 日-13 日

2019 年 4 月 12-13 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建院一周年之际，由研究院主办的“面向 21 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 位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以及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共百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为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此次会议设置了六个平行分论坛，主题分别为新世界，新区域；区域研究的理论范式；区域研究的地区经验；区域研究的美洲视角；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区域聚焦：东南亚与中东。

一、新世界，新区域

经济学人智库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Tom Rafferty 对 2019 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Rafferty 认为，首先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中美贸易战、欧盟和美国内部需求疲软都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但同时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增长将保持强劲势头。其次，中美贸易战会持续。第三，受“一带一路”倡议等因素影响，全球范围内原有的权力分配平衡会被会打破。

总体而言，2019 年全球经济将出现下滑。北美、欧盟、中国等几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非洲、拉美维持增

长，印度持平，东盟处于下行趋势。此外，贸易战将是2019-2020 年度全球最大的风险，大型债务风险占全球十大风险中的三个，其中中国债务比例不断上升，另一个焦点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住房债务问题。石油价格不断波动，未来几年石油价格会维持在 60-70 美元之间。汇率仍是受关注的重要内容，目前美联储有软化美元的倾向，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逐渐走强，从这个层面看，美元会在未来季度继续走弱。人民币或将随着经常账户盈余的下降而贬值，但对资本外逃的警惕和美国反华鹰派的举措将导致中国央行放慢贬值的步伐。

Rafferty 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紧张局势仍可能继续，农业、货币、知识产权等方面会受到影响，中美双边谈判也许将会持续较长时间。2019-2020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尤其是 2020 年第一季度甚至可能出现下降，这对美国经济构成一定挑战。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经济将走弱。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可能会受中美贸易战和债务问题的影响，在 2020 年 GDP 增速保持在 6%左右。另外，中国也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等突出问题。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 Yoichi Mine 在发言中阐述了面向 22 世纪的非亚框架。她表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将在 2100 年达到 112 亿，其中亚洲人口约 47 亿，非洲人口约 41 亿，届时世界 80%以上的人口将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就全球而言，亚洲将在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保持重要地位。然而，由于亚洲人口在 2001 年已达 37.8 亿，因此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非洲。人口扩张将导致全球人口分布

的彻底转变，由此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因此，未来非亚将持续享有人口红利。

非亚人口的持续增长也会带来许多挑战。第一，人口的快速增长将给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或粮食主权带来巨大压力；第二，在促进农村发展过程中，非洲将遭遇全球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第三，城市化将成为非亚地区的一大挑战，对民用基础设施的需求将是巨大的；第四，国际移民将加速，移民的主要模式将从南北向南南转移；第五，国家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强的协调力，主动有效地处理人口快速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儿童问题、妇女问题。

Yoichi Mine 认为，决定人口的因素有三个：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尽管非洲妇女的总生育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开始下降，联合国也预测称 22 世纪初非亚人口“80%多数”的局势将是一种“静止状态”，而不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人口爆炸阶段，但毋容置疑，非亚地区庞大的人口对世界未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政治上，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在非亚的连接地区，即中东和北非的政治稳定，如何实现和平仍是关键问题。非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交流质量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未来形态，但目前来看，这两个地区之间负责任的对话和相互学习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因此，未来亚非地区的大国不应像欧洲人过去那样行事，而是需要自信地相互合作，以应对面临的多重挑战。

伦敦国王学院非洲领导力中心副研究员 Barney Walsh 阐述了关于非洲发展与安全挑战的一个重要议题——非洲的

“国家”概念及其作用。

在非洲有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权力关系，如殖民主义、奴隶制、冷战等。非洲的国家制度是国际性的，更准确地说属于西方治理范式，主要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马克斯·韦伯的准则中关于国家的领土主权、中央政府集权（有时是通过暴力的形式）、公民和国家间的社会契约等话语。但这种体制对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明显不适用，非洲很多地区还存在着许多使用传统治理方式的原始群落。这种西方、殖民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传统、落后观念之间的张力，由于缺乏转变，在当下造成了更多反复出现的冲突与问题。

世界正处在原子化和全球化时代。原子化指的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动态过程中主要依赖于不稳定、自发的个体行为和因松散疏离的国家结构。全球化是指通过全球贸易、通讯、交通、移民，实现社会政治文化趋同和一体化。在非洲发展过程当中，国家的作用很复杂，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国家构建的因素都在彼此互动形成平衡的结构，例如联合国的出现及其在地区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先前的国家政府管理被看作是失败的，而中国不仅为非洲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还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上提供了许多经验。

中国为非洲修建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了农业示范中心等，除了物质层面的互动，中国也在帮助非洲建立国家架构，例如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中国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坚持不干涉主权原则，虽然这种“不干涉”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做，然而中国并没有不管不问，而是运用另外一种接

触方式，比如培育精英人物和政治参与者、增加非洲军事人才力量、邀请非洲代表团访问中国等等，这实际上是国家结构塑造的种种要素。

西方自古以来对非洲的态度比较傲慢，但同时太过天真无知，对非洲复杂的问题总想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这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非洲的问题非常复杂，也在不断演进，因此需要更多有益的思考与讨论，达到平衡才能确保发展。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介绍了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非洲研究。她表示，中国的非洲研究起于北京大学，由杨人楩在 1958 年创立。杨教授建立了具有特色的非洲研究，强调要让中国学者掌握语言和一手资料。1962 年杨教授推出了针对非洲的课程，利用自己的资金和人脉网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积累了关于非洲的档案和一些杂志。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第二代非洲研究学者，主要分为三个研究方向：北京大学重点是非洲史、当代问题。社科院有专门的非洲研究中心，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策导向方面。南京大学主要研究地理经济、农业问题。这段时间，非洲研究教学开始对学生进行系统地培养，组织了非洲通史的学习、强调外语能力，后来也与国际学者有了更多的合作。

进入新世纪后，从官方角度看，中国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政府对中非关系进行了大量投入；从商务角度看，中国企业大量涌入非洲进行投资与合作；从公众角度看，中国民众也希望对非洲有更好的了解。这一时期出现了新一代的非洲研究学者，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进行了非常好的研究。同时，大量的非洲学生来华学习，毕业后回到非洲，以

各种方式贡献于中国与这些非洲国家的交往联系。

刘海方认为，非洲研究目前正面临着逐渐失去动力的问题。尽管政府提供了一些激励机制促进非洲研究的展开，但学者该如何自发地推动非洲研究是一个问题。非洲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但人们并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这就需要加强研究的机制建设。此外，目前传统的非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面临较大挑战，而借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将有助于非洲研究的更好开展。非洲研究应与区域与国别研究加强合作，非洲学者也需要关注新的机制并促进其发展。

贝尔格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Dragana Mitrovic 从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说起，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欧国家的影响。

Mitrovic 表示，中东欧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渊源，一部分国家原属于苏联政权，一部分国家则加入了北约，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存在很多差异。此外，近几十年来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从而导致它们有不同的经济需求和利益考量，这使得中国在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很难进行统一的市场规划。

与此同时，欧盟对于中国对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干预”持警惕态度。中国曾给予属于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带有优惠政策的贷款，主要是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对此，欧盟担心中国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弱化了欧盟的机制。欧盟认为，这种方式或许是一条捷径，但不利于这些国家的长期发展。一方面，欧盟内一些国家依赖于中国的投资和贷款，有时是以参与“一带一路”的名义；另一方面，中国也依赖于

这些国家，用贷款换取某种利益，比如华为等企业进入欧洲。许多欧盟成员国也对中国的意图发出质疑，它们不确定中国通过资金和贸易往来控制部分欧洲公司，甚至在一些行业领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过，整体而言，中东欧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对于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仍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其政策也在逐渐转向促进区域共赢、积极参与贸易合作的方向。

柬埔寨王国皇家翰林院秘书长 Peou Yang 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全球政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努力下，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能更好地在政策制定、联合国维和、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方面，利用联合国平台作出重要贡献。

冷战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得重要进展。通过改革开放与不同国家交流合作，中国实现快速增长。近三十年来，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为此，柬埔寨希望学习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经验，更好地推动自身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将亚洲与欧洲连接在一起，为沿线不同的国家制定了很多合作项目，在不同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很多东南亚国家也希望与中国开展长期合作。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积极评价。

Yang 表示，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吸收了大量对外投资，带动了就业与发展。对于中国的投资人来说，他们也应当关注本地的文化，介入本地社区、学校、教

育等，这也有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中国与柬埔寨开展了很多良好的合作，建立了很多相关的机构，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越来越大。柬埔寨希望今后与中国进一步推动合作，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促进地区发展。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秘书长高健阐述了他对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理解与看法。他认为，过去很长时间，在讲到国际关系时，都找不到中国范式适合的理论框架，很多时候用的是西方的思维模式，在研究问题时用的是西式研究方法。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从学术思维角度看，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形成是受一些因素影响的。首先是动机，即研究的目的和动力；其次是视角，即以何种角度观察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研究的范式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动机而确立的，比如殖民时期区域研究是为殖民服务的；二战后美国发展区域研究是为建立世界霸权服务。那么，中国现在开始进行区域研究，是否像亨廷顿所说，是要成为英法美德之后建立霸权的国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的发展不是通过掠夺、殖民他国，而是通过几代人辛苦努力得来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过去在实践中奉行的是和平主义的思维，未来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础也是和平主义。与此同时，当今国际社会对世界的未来普遍持悲观态度，认为世界将会越发不平衡，但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看，很多内容都涉及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衡，实现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平衡，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因此可以认为，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将是推动中国

区域国别研究理论自觉和范式形成的最主要动力。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探讨了语言及其传播方式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影响。她指出，语言作为日常生活交流互动的媒介，早已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媒体研究以及传播学具有更深入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讨论，而跨学科研究就是要不断打破各学科学术的壁垒。随着众多社交媒介平台的兴起与发展，听说读写的方便快捷，让交流沟通无所不在。传播活动以及媒介形态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心理、行为，也在静悄悄地变革着社会，它们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

互联网社交媒介的发明无疑是继电子媒介后的又一场革命。社交媒介中用户全方位参与到各种交流互动中，自由制造或选择场景背景，人们在情态、知觉、感知中进行互动、互鉴、互生。这也意味着公众交流凸显出价值理性的重要性，众多思想观点在多层次、多系统中跳跃，以语言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也更加生动与复杂。为此，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要注意不同叙事方式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警惕认知的迷思，重视自我的间离、陌生化与国族、社群身份的认同与归宿等问题。要认识到人们在交流与沟通中的媒介选择、语言表达、叙事方式、认知模式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性，并理解其差异性中所具有的统一性。

二、区域研究的理论范式

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副院长 Christopher Gerry 首先阐述了他对区域研究学科的理解。他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区域研究显得很独特。一方面，尽管从事

该领域的研究者不少，但很少有人了解该学科的演变形成过程以及该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另一方面，在一些场合，区域研究并没有作为一门学科被承认，一些学术期刊不愿刊登反映区域研究成果的论文。此外，有观点认为，高校的区域研究应当承担智库的功能，为政府提供数据和政策参考，但如何有效地利用区域研究的成果仍值得探讨。也有人抱怨，区域研究具有排他性或绝缘性，这或许是指其他学科对区域研究仍知之甚少。

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和批判，区域研究者应坚持以下几点：首先应保持自我反思性，更多地关注研究地区的特殊性；区域研究有巨大的跨学科潜力，但这种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应当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两种视角，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还应对知识性的生产多加反思和批判；区域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应当基于广阔背景，注重基本问题，关注普遍性规律；要建立求同存异的对话模式，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在不同语言、文化间来回游动，要挑战所谓的“真理”；要与学者更多地交流，而并不是仅仅了解事实，通过对话实现关联性。

首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In joo Sohn 在发言中表示，政策可行性理论（Policy-Applicable Theory）是区域研究和社会科学融合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域研究需要解决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主权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环境发展问题、失业问题等。对于这些全球化时代中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需要区域研究建立可运用于政策中的知识和理论，相关成果能够提供一些概念模型和政策工具，以适用于政策制定。

政策可行性理论强调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问题驱动之下进行的区域研究，既不是去检验所建立的普遍理论的解释能力，也不是要提供关于解决某个区域性问题的具体方法和建议，而是要建立一种政策工具的概念化模型，这种模型将建立在多样的理论传统之上。

问题导向下的一些专门研究，比如对中文的研究，可能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方面存在困难。为此，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跨学科的共同研究，从而为将研究成果用于更广泛的其他学科领域提供可能性。就中国研究而言，跨学科研究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研究中国政策。从学科角度来说，中国有太多支离破碎的研究领域，问题导向和量化目标也不一样。社会科学家习惯于用大量数据进行研究，有时反而会成为研究的“孤岛”。为了避免出现“绝缘研究”，宜采取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

政策可行性理论在东亚经济合作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实践，比如提出仿照 IMF 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稳定的货币联盟，创造共同的汇率体制。而若想成立东亚的经济合作体或货币基金组织，首先需要各国进行主权让渡，以化解竞争压力，强化区域身份认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介绍了地区和国际研究的美国体系及其对当代中国区域研究的启示。

他认为，区域研究首先应强调研究的国际性面向。近几十年中，“international studies”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向区域研究，相较于“area studies”，这一表达更适合于一种国际性的知识综合体。这意味着，在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时，也要

强调研究的国际性面向，将原有学术体制中所有涉及外部世界的领域和因素予以动员、协调和整合。

其次，东方学的研究路径存在缺陷，区域研究需要学术制度的加持，也需要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抛弃了东方学的研究范式，将以前不被包容、接纳为正式学术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正式纳入学术领域，并通过学术建制的形式使其合理化、合法化，在研究方法上则更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再次，区域和国际研究是庞大、复杂和重要的研究，因而不能也不应以“智库”框定和引导，否则将同时损害区域研究和智库的“智性”。战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主要存在于大学体制当中，并且在大学内部主要存在于“文理学科”的框架之下。这种基本制度规定了区域研究作为基础性学术和“专深研究”的身份和属性。

第四，尽管区域研究的根源使得区域和国别研究不可避免地更加关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向度的研究方式，但区域研究还应注重自身的文化领域，它供养和涵育了关于对外部世界知识的问题感，决定着对外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风格和厚度存在。

尽管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有各种问题、困境和缺陷，但基于它在当代世界性专业化学术体系中所具有的深厚的理据和根基、规模、成果、影响力和典范意义，以及在历史上呈现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变迁、自我变革的能力，中国必须重视、理解、并参照它。当然，中国不应也不可能复制美国模板，但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当代

努力中，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实际历程和思想资源，包括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资源，应当成为中国获取原理性认识和方法、策略的重要来源，甚至应被视为知识和思想上的重要起点和基础之一。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Aviad Kleinberg 的发言主题是“学习历史，塑造未来”。他认为，历史涵盖着许多过去的领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自然环境如地理、气候变化相对较小，而语言、文化、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很大，同时人性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因此，分析横向与纵向的差异性同样重要。20 世纪下半叶，有观点称历史无法予人启迪，所谓以史为鉴，实则是带着偏见进行研究，经常产生误解。对此 Kleinberg 认为，历史是人类知识和智慧常年积累的宝库，我们应保持审慎的态度，重视历史积累的经验。

Kleinberg 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边界更加模糊，新兴政治力量逐鹿世界，政治上的敌友泾渭分明。这种局面构成了区域研究的一大挑战，即挑战了研究的“舒适区”，人们只能通过思想上的双重穿越来理解对象区域的文化。此外，全球文化的沟通交流，往往会产生误导性影响。新的形势要求研究者不能在旧数据体系中构建新思维范式，而要看到世界秩序和全球价值观的关系。

Kleinberg 指出，“丝绸之路”或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的核心。它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现象，但该倡议并非怀旧，而是面向未来之举。在新型丝绸之路上，以色列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是特拉维夫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以色列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要冲，应当发挥跨越与弥合鸿沟的作用。外界曾担心

研究中心的分析框架是否会被政客、企业家控制，Kleinberg 认为，经济、政治、科学、历史应该融会贯通，并不是为了丝绸之路而开展研究。最后他表示，历史学不仅是区域研究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种区域研究。研究者应当追问历史研究能否形成反思，并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议。

南非大学全球对话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Sanusha Naidu 介绍了南非发展区域研究的基础和现实。她表示，在南非开展区域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南非对于非洲来说相对独立，学术研究既要以史为鉴，也需关照现实。

首先，南非的种族歧视、部落关系、政治文化关系等因素都对区域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在南非，身份问题会影响到教育体系。南非有精英教育和次等教育两种层次的教育体系，它们在高等教育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教育体系之下，各个群体都渴望自我的身份识别，这就给相关课程的设置和命名带来了问题。

国际关系和外交对南非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是区域研究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的，比如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针对南非的孤立政策等。种族隔离研究也是南非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纪 90 年代的南非，政治、历史、社会学等学界热点和课程设计，都围绕着谈判推动和平模式的可能性这一话题。

南非对于非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其重要性，世界的融合也无法忽视南非的声音。世界如何看待南非和非洲是一个重要问题。南非还重要吗？它还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吗？南非的经济分配原则是否公平？这些都是讨论热点。南非的

智库、大学在传达南非声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对区域研究缺乏定义以及专业维度。这或许将随着政策的制定而有所发展，因为所有的研究都与现实的动向有关。学术研究上的竞争催促着研究者思考如何定义区域研究的学术空间，这将影响到资源向何处倾斜。此外，区域研究的研究方向在哪里？是否该以政策为导向？学生对于区域研究的兴趣在何处？该如何推动区域研究的普遍化、大众化？这些都是南非区域研究未来发展所要面对和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陈琪对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表示，区域和国别研究在中国一直存在，只是此前的研究尚不在正规的学科建制之内。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利益、需求越来越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愈加紧密，亟需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贸易、经济和法律体系。与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逻辑起点相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研究热度的提升与急迫的政策需求紧密相连。

除了政策需求，区域研究的发展也需要学科、知识创造的内在动力。在过去 40 年中，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蓬勃发展。然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是把国家当成一个“黑箱”，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在性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在能力上有强弱之分。而现在，当“黑箱”被打开后，学科本身的新知识该如何增长？比如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与无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性质上可能不同，认识到这种不同将会为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打开另一扇大门，使

得区域研究讨论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区域研究应当具有问题意识。区域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话题，但目前的学科建制非常分化，一国的知识被分割为经济、法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在这种压力下，研究应当努力发现人类还未解决的知识上的问题，体现跨学科的分析思路。相比这些问题所属的领域和解决范式，问题本身的意义更为重要。

目前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行政上的编制机构、政治机构建制，否则在资源竞争上将处于劣势。其次，目前缺乏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权威性期刊，现阶段产出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文章不能被最优秀的期刊刊登。第三，课程体系的设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最后，以何种方式考核学生的知识储备，以及如何在考试中设置涉及基本原理的题目，都是需要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的发言阐述了区域研究如何从社会研究中得到启发。他指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重要作品《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但很难说它不是一部区域研究的作品。中国社会本身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区域进行区域研究？能否从这样的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中获取区域研究的经验？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过去 40 年累积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知识，但时至今日，仍感觉仅从政策、政治制度等表面现象了解社会，显然不足以理解使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深层知识。这也就决

定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两重性：既要从中国社会表面上的政策、制度、社会结构出发，也要看到深层的影响机制。由此，“社会底蕴”的概念被引入。“社会底蕴”是指在时代变迁中大量保留的、不变的行为模式。比如尽管中国经历了很大的社会变迁，但却保留了文化的一致性，并且与时代紧密结合。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对应着不同的行为伦理，不同的行为伦理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样一个关系网络，以及相应的行为模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模式。“差序格局”理论被大量应用，原因在于它不是表面的结构、政策，而是深度知识。

代表中国社会传统的丧服制度，便可作为这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呈现来理解中国传统家族的范畴。例如，五服制度直到今天，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被普遍应用，这不是书面、理论的知识，而是口语性的知识，一种真实存在的行为模式。不同的丧服对应着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体现着伦理。与丧服制度相关的社会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行动伦理的基本结构，而这样的结构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存在。这样的行为和其中体现的伦理是人们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综上所述，人类学起源的基本特征是研究他者的文化。因此，完全可以把人类学、社会学纳入区域研究，使其成果为区域研究带来某种启示。

三、区域研究的地区经验

圣彼得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Nikolay Samoylov 重点

阐述了对于“边界区”的研究。他以中俄边境地区自 18 世纪起逐渐发展和深入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共生现象为切入点，介绍了“边界区”（Frontier Zone）这个具有广泛的政治、地缘政治和文化意义的概念。

在现代学术界中，边界区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现象，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和工业，还包括哲学、文化、精神和心理方面。边界区是两个不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特定中间区域，吸收了双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多种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边界两侧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呈现出“复调”的特征，比起与自身的政治、行政和社会文化“中心”的关系，边界区的人民与邻界区往往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的联系更为紧密。Samoylov 强调，边界区可以帮助形成使文化传统和规范得以稳定共存的地理文化空间，因此将边界区理解为沟通和互动的区域而非障碍，是非常重要的。

Samoylov 运用中俄边境区两国社会文化互动的例子，说明边界区研究的重要意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种大型的社会文化系统在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自身地理文化空间的同时，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空间的相互影响在 18—20 世纪期间也在持续发生。如今仍然可以在中俄边境区观察到中俄社会文化的频繁互动，如布拉戈维申斯克和黑河、扎拜卡尔斯克和满洲里、绥芬河和格罗德科沃等边境城市都展示了这种地缘文化共生的现代例证。Samoylov 指出，中俄边境区自成立以来就代表了一个积极的社会和文化互动的空间，现在两国的人民也在这个区域的各个领域进行着互动，而对这些过程的

深入研究应成为当代地区研究的组成部分。

俄罗斯远东学院亚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Alexander Lomanov 就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以及当前对于东方学的探索进行了发言。

Lomanov 首先谈及近年俄罗斯学术界出现的争论，即是否要将东方学研究归入政治科学。一部分学者认为，东方学是综合性研究，应了解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而非某一个学科，否则会失去其科学性。另一派学者的态度则相反，强调研究中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不存在停滞的发展，儒家是中国全面进步的发动机。

强调中国研究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汉学家必须懂汉语，必须要理解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他定义了三种汉学家：完全的汉学家，部分性的汉学家和只看外语不看中文的汉学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中国研究形式：一种是没有汉学的中国研究，包括 19 世纪的圣彼得堡研究和 20 世纪 20-30 年代与中国意识和文化完全脱节的莫斯科学派；另一种是没有中国文本的中国研究。阿列克谢耶夫认为，研究中国要依照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没有中文原本资料的研究就不是汉学。

Lomanov 强调，研究当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中国传统方式和自我调整以适应现代的特征。汉学研究对俄罗斯外交与亚洲有很大意义，国别研究作为跨地区研究的模板，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Lomanov 认为，当前的中国研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中国文化的把握，汉学家必须对中国对外发展的道路和中国的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有所理解。对非西方的研究也应如此，要把地区研究放在实际环境中，加强民族意识发展等各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俄罗斯区域研究来说，当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一方面要发展非西方地区的区域研究，保留和继承俄罗斯东方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以东方式的包容为方法论，力图使国别和区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相互排斥，并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段德敏在发言中认为，目前欧洲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也寓示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段德敏首先指出了欧洲整合的巨大优势，主要包含和平发展、经济繁荣、自由度增加和人权保障等。但同时，他也指出近年来欧洲内部反对整合的声音在大幅度上升，其主要特征有反对外来移民、对欧盟持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要求“夺回主权”、左/右翼民粹主义日趋强大等。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来源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一是着眼于欧洲治理的失败，二是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出发，对人们是否从长远角度考虑自身利益和需求提出质疑。

对于如何合理安排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段德敏指出，整体利益和地方利益不可能随时都能互相协调。因此，欧洲认同对欧洲计划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同样，目前欧洲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也预示着全球治理正处于困境。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从全球和区域之间的角度分析了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挑战。他指出，近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旧的国际体系正在崩塌，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形成。二是新

型大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还有印度、土耳其、伊朗、巴西、俄罗斯等，每个大国都在进行自我的重新定位。三是今年是国际关系学诞生一百周年，对比当时，世界上新增了一百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很多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尚未全部完成“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建构就进入了信息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新时代，因此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四是发达国家发展逻辑、治理体系都面临着挑战，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正在改变国家的制度安排，民粹主义的崛起只是一个序曲。最后，区域共同体可能是新世界的出路。诸多大国的力量要寻求平衡，美国独大、一种价值观影响全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对于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刘德斌认为，我者与他者的观念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者与他者的演化有三种逻辑：我者通过血缘、地域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与他者构成了对立；我者的构建以他者的对立为前提，例如欧盟形成于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对立，如今两极对立已不存在，这是否是欧盟困境产生的原因？三，我者与他者存在着分化和重组，我者可能同化他者，也可以被他者同化。

刘德斌表示，至今国际关系理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上仍找不到出路，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悖论：国际关系研究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一战悲剧的重演，而国际关系培养的人才常常只关注如何能让自己国家在竞争和博弈中获胜。如何解决这一悖论，有待后来学人的智慧。

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Kimitaka Matsuzato 的发言主题是《文化地缘政治与区域研究》。他认为，地缘政治具有

双重意义。其中文化地缘政治既包括了身份认同政治，也包括跨国主义。从传统定义上讲，政治是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部分组成。但实际在世界政治中，有些时候非国家的组织之间会产生联系，它们反过来也会和其他国家政府产生联系。因此，“越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其非国家组织就会越强大；而国家强，其非国家组织则弱”。这是因为，如果国家相对弱小，国际跨国组织就很难与其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因而在国际合作上问题上，需要非国家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在区域研究中，应避免文化地缘政治与其他几个概念的混淆。首先是文化地缘政治和“原初主义”的区别。文化应被视为是一种自然要素，而不是原则，所以文化可以被重塑，可以被重新诠释。其次是文化地缘政治与软实力的区分。非国家组织虽然拥有软实力的影响，但软实力一般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公共关系和外交中。在这样的外交关系中，非国家组织只是扮演辅助的作用，它们之间会有利益冲突但也会有协调一致的时候。第三是文化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区别。“地缘政治”即代表着“战争”，尤其是影响于边界区域的地缘政治因素。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时期，主要行为体都是国家，但在当今世界，国际文化组织则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软实力的作用。因此在区域研究中，要对代表文化地缘政治的非国家组织具有的重要影响力有正确认识。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Baliram Deepak 探讨了印度国内的中国研究现状。他以中国研究在印度各个历史阶段的传承、转型发展为线索，分析了各学派对理解和研究中国做出的贡献，以及区域研究在学科建构和发

展上面临的不同问题。

Deepak 认为，区域研究作为欧洲东方学的脉络延伸，以及二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重点发力的学科，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印度的区域研究发展也并不乐观，如何使融合了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更充分地汲取每个学科的理论优势，并且把语言和翻译研究也纳入其研究维度，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Deepak 强调，区域研究学者必须充分重视对当地语言及文化的了解，才能构建出合理的理论框架，因此必须在印度加强语言学科和区域研究的整合。

与大多数印度专家将 1918 年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中文授课课程作为中国研究的起源不同，Deepak 认为，印度的中国研究源起于传教士约书亚·马什曼，他于 19 世纪初从孟加拉引入了中国研究，当时他不仅翻译、印刷了圣经，还在 1809 年出版了第一本英文译本的《论语》。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过于浅薄，出于战略和安全利益考量，对中国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机构随之建立，如 1955 年成立的印度国际研究学院（ISIS）和于 1970 年成立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德里大学还设立了独立的中国研究中心（1964 年），并于 2003 年改为东亚研究系。与各种中国研究学派并行的是由印度外交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CSG）智库运动，该运动虽未能弥合中国研究与政治学核心学科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距，但它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并且最终奠定了新德里中国研究所（ICS）的基础。然而，由于这些学

者对于语言的掌握水平达不到进行专业研究的程度，他们也无法解决学科发展和地区研究融合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

Deepak 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探索，尽管区域研究目前仍旧面临着诸如研究和学科设置脱节、受制于欧洲中心主义、缺少必要的文献资源和资金支持、语言和区域研究整合不到位等诸多问题，但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太平洋的权力发生转移，印度的中国研究仍有广阔前景。今后一方面需要政府投资建设更多中国研究中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学和相关机构共同努力进行研究。

四、区域研究的美洲视角

美国圣母大学副教授 Jason Ruiz 探讨的话题是美国研究与超国界转向。他指出，美国研究在二战后开始形成，之后在冷战中加速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和入学率的提高，政府开始资助美国研究项目。在冷战条件下，美国研究的学者采取了一种广泛的国际方法来研究所谓的“美国性”。当时的许多学术成果都支持美国例外论的政治立场，强化了美国在世界秩序中占有独特、强大甚至优越地位的观念。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大学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学术界开始对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作出回应。学者们开始拒绝采用例外论来研究美国，并寻找不支持冷战信仰体系的思考“美国性”的方法，而冷战信仰体系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具有天生的独特性和优越的力量。相反，这一时期的学者开始质疑许多与美国文化相关的中心思想和信念。

冷战后美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超国界转向”成为学术运动的一部分。“超国界转向”

是指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将超越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动力。有人认为，对于这场知识分子运动来说，更好的说法是“后民族主义”的美国研究。一些学者由此认为，“American Studies”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美国的研究，而是对整体美洲国家知识的兴趣。这意味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研究美国性，理解“America”指的是所有的美洲，而不仅仅是美利坚合众国。

Ruiz 认为，讨论美国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关系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美国，两者都是冷战时期的发明。虽然早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研究就已被视为一个区域研究领域，但如今大多数学者对这种关系感到不快，表示美国研究试图挑战而不是加强国界的真实性。Ruiz 强调，美国研究和区域研究是在冷战时期诞生的，但美国研究已经在国家的研究类别中产生了显著的转变。这一点可以从他所在的美国研究学部得到证实，该部门主要从事美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关系、种族和代表性的研究。他希望在此次有关区域研究的研讨会上，通过交流与探讨，能从美国研究的超国界转化中收获更多的启发。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达巍的发言聚焦当前国内的美国研究现状。他表示，在中国的国别研究中，美国是最大的研究客体。美国问题被中国各界人士所关注，且美国研究经常与中国的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完全混同在一起。

目前在国内，美国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处于一种割裂的关系。很多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不认为自己处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之内。与此相对，美国研究与美洲研究之间也

存在着隔阂。很多服务于“美洲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多是研究拉丁美洲国家，并不包括美国。实际上，美国研究和美洲研究之间存在的不同导向不仅来自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也由于中美、中拉关系背后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学科支撑。中美关系更多地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研究、经济研究、国际关系，而中拉关系更多的是关于发展的问题。

国内对于美国研究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取向，二者几乎是一种“平行宇宙”的关系。其一是政策需求刺激之下的美国研究；其二是人文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导向，虽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政策需求似乎是在吸干美国研究的氧气，阻碍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达巍强调，提升美国研究的路径有三个方面。首先，要提升重要人物研究的水平，不能仍局限于人物生平的研究中，同时加强科学化程度及政治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其次，尽快解决准确信息的获取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存在三大阻碍：信息泛滥质量太差、信息多元不易分辨、信息流动受阻。特别是在当前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有意对中国学者的交流活动进行阻碍。最后，加强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美洲研究和美国研究的分裂、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分裂都有其原因，加强融合应当成为首要任务。此外，应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界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研究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从而提高美国研究的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的发言主题是区域与国别视角下的拉丁美洲研究。他认为，近年来中拉关系实现快速发展，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对拉丁美洲

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政策支撑力度超过了学术论证的程度。中国的拉美研究不是学者自下而上地主动提出一些观点，更多的是从上到下的政策引导，从这一角度来看要弱于美国研究。其次是学界论文的标准和期刊杂志关联较大。这种历史惯性的存在和机制使得区域国别研究难以发表理论性的成果，受其影响，即便是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对于巴拿马等重要的国家依旧了解甚少，评估机制亟待改进。三是国内研究者对于拉丁美洲的定性研究充足，但定量研究不足，甚至几乎没有定量研究成果，比如关于拉美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的数据和资料就很难找到。四是软实力研究不够。中拉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交流日趋紧密，但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较少。中国人民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中，“足球”是仅有的关注度较高的点，而对于拉美国家的其他方面则了解甚少，应当加强民间交流，把握更加精确的研究方向。最后是缺乏交叉学科研究。应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思考，加强不同行业间的对话探讨，建立一个包括企业家、媒体、学者、外交官在内的学术共同体进行定期交流。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发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更加重视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中国一直把中美关系作为最敏感、最重要的关系，而拉美的很多状况与美国息息相关。另外，美拉贸易额是中拉贸易额的三倍，美国对拉美的投资是中国的两倍，中国对拉美投资的加速度高于美国，但总量依旧较低。上述情况使得中美关系成为中拉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次，中拉合作应借助第三方力量，比如通过东南亚、日本加强合作。中国已是海外并购最多的国家，在拉美亦是如此，这引起了国际上很多批评。中国应当弱化中国色彩，主张互利共赢，从而推动区域间国家合作。中拉合作也应更精准地确定合作国与对象国，重点选择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国家。

最后，中国应遵从市场运行规律，较少考虑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例如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就是忽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结果，因为相较而言，智利在各方面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实际上与智利的合作要弱于委内瑞拉，从这方面看，中国应当更加注重投资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在发言中也探讨了中国拉美研究的趋势与挑战。

中国的拉美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初之前，国内对于拉美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古巴导弹危机后，拉美研究进入了发展的第一阶段，一些高校开设了拉美研究的课程。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拉美研究因国家状况而陷于停滞状态。1979 年后，拉美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中国拉美史研究会、中国拉美协会、中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三个重要组织建立，此后很多高校成立拉美研究机构，拉美学科体系逐步完善。进入 21 世纪后，拉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研究成果丰硕。

当前国内拉美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在研究机构上以社科院拉美所为中心，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学术和研究机构。高校中有很多拉美研究中心，政府机构中负责拉美

事务的部门也开展了很多有效研究。在学科体系上，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拉美文学等传统教学领域，研究拉美历史的高校不断增多，一些外国语大学对拉美文化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为全面的水平。最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能力与水平相比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国际对话能力不断加强。

当前国内的拉美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发生新变化，除了传统的翻译和介绍国外著作，对理论和现实政策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范式同样发生巨大变化，既注重基础研究也注重前沿研究，很多致力前沿研究的学者已经采用新的学术范式深入到拉美城市化等前沿领域。研究领域更是趋于多元，新的学科受到重视，如文化人类学、法学、宗教学等等，一些有条件的学者还能够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拉美研究。

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教授对提升中国拉美研究水平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当前国内拉美研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研究队伍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青年研究者专业经验比较缺乏。其次，研究机构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机构规划性较差，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第三，对于国际学术发展趋势的关注度不够，导致国内的研究往往滞后于国际前沿。从历史学角度看，应加大对国际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新趋势的关注。第四，拉美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等的界限还没有完全打通，无法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角度看，除了掌握一手史料外，还应多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智利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Felipe Muñoz 探讨了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下的拉美地区贸易政策。

他表示，有研究表明，世界 GDP 指数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现下滑后缓慢反弹的趋势，为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进入了复苏期。但实际上，当欧美的经济状况出现复苏迹象时，拉美市场正在缩水，商品价格也有所下降，这方面的经济波动已经引发了拉美国家的高度重视。联合国的数据表明，虽然来自拉美国家的商品出口在危机后有所复苏，但仍未能达到危机之前的出口量。此外，尽管拉美的出口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多数国家的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组装，拉美国家通过出口自然资源主导型的商品赢得的收益相当有限，加之其高附加值的工业较少，市场价格十分脆弱，易受外界因素影响从而产生波动。与此同时，如果与拉美合作的国家出现 GDP 增速变缓的情况，拉美国家会立即受到影响，因此拉美国家要想保持稳定的增长相当困难。

从国际角度看，拉美很多国家国际地位不高，对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依赖较重。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规则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对拉美国家形成致命打击。如在 2001 年发起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尽管作为主持国之一，却未能促成任何协议的签署。如今，随着电子商务规则越来越细化与完善，特朗普政府新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对电子商务领域形成明显冲击，而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府却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在国与国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许多拉美国家内的很多阶层仍没有收获全球化的红利。在特朗普的影响下，美国退出了 TPP，北美贸易区的规则被重新制定，对于拉美国家

来说也并非利好消息。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南美国家大多由中左政党进行管理。而从 2010 年开始，拉美地区的政治形势从中左转向中右，甚至趋向于极右。拉美地区从一体化进程转向开放式的谈判进程，一些国家开始进行单边贸易改革，试图尽快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实际上，各国应对贸易和双边合作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因为事实表明，世界上很多主要经济体的互动都会对拉美产生影响，包括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美国自贸区的发展、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等等。欧盟虽然也会对拉美产生影响，但目前欧洲内部的混乱状态客观上要求拉美国家要静观其变。未来，如何让拉美地区更好地适应新的世界形势，是每一个拉美国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

杜克大学人类与历史学教授 Eng Seng HO 的发言聚焦区域间联系的新型区域研究。他表示，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领先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为了给政府对外政策提供信息，美国在多所大学开展了区域研究，通过狭窄但深入的方式培养出一批了解他国家各方面状况并能掌握当地语言的专家。中国目前也正经历着与美国类似的，需要重新调整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区域研究开始兴起。中国在开展区域研究时，不能重蹈欧美在学科建设时的覆辙，而是应建立起聚焦区域间联系的新型区域研究。虽然地缘争端和冲突在新闻中占主导地位，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其他重要关系如金融、贸易、媒体、移民、宗教、教育、社会流动、跨文化婚姻等现象仍未得到充分研

究，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也都需要知道在狭隘的政治对抗之外，世界还面临着很多其他潜在危机。研究这些社会现象是聚焦区域间联系的新型区域研究的紧迫任务。

Eng Seng HO 认为，“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国和东欧、南欧、非洲正在建立更好的关系。“一带一路”既能帮助中国扩大国内市场，又能使中国有机会接触世界市场，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助力中国发展。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学术界就已经产生了将中亚、西亚和东亚联系起来的亚洲一体化的新视角。这种视角可以回溯到 16 世纪葡萄牙殖民时期之前亚洲内部各国互相联系、彼此学习的格局。殖民历史给中亚、南亚和东亚之间带来了分割与隔绝，也给学术研究制造了很大困难。冷战后由于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亚洲的重新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连接各国的轨道，为亚洲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机会。

Eng Seng HO 对于聚焦区域间联系的新型区域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出了四点建议：首先，应在培养方案中强调机动性，使学生有机会到对象国进行田野调查。要应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流变，找到新的切入点。其次，注重研究地区间的有机联系，而非单纯的对比研究。跨区域研究不仅要关注社会内部的流动，还要关注过去分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注重资源的循环流动因素，认识到自然创造了资源的流动，将不同社会国家的社会单元融为一体。最后，应从外部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应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阐述了“一带一路”经济理论的范式研究。他指出，从地区及全球发展角度看，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三种诉求：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2008 年至今，世界经济处于发展低谷期。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分化加剧，国内收入差距大，美国、欧洲政局黑天鹅事件频发，世界经济亟需新的发展动力。二是亚洲崛起的内在诉求。在封建时代，亚洲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然而 18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后，亚洲整体开始衰落。2012 年，亚洲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洲，亚洲内部也需要新的力量重新整合世界资源。三是全球两极分化的内在诉求。当前，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较高，社会撕裂严重。应寻找新的解决世界分化的思路和方法，推行“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提供的方案。

张辉认为，“一带一路”的内在经济发展范式体现在价值循环。在世界经济的分工合作框架中，超过一半的经济体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向其销售中间产品；与发展中国家加强产业和产能的合作，购入其初级品。从全球价值的循环来看，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世界形成了以中国为桥梁的小循环体系和世界的大循环体系。

张辉表示，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反哺出巨大的制造业，为发展中经济体的现代化、工业化提供了相对较低的门槛，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连接点。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成功，如今适时提出“一带一路”是负责任的表现，中

国的成功经验可以供发展中经济体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金砖国家合作中心主任王磊在发言中介绍了对于金砖国家研究的发展情况。

目前在中国学界和政策界对于金砖国家研究的内容尚未统一，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基本等同于国别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之外的四个主要成员国进行研究。第二，认为金砖国家是一种复合、跨区域的研究议程，侧重对金砖国家开展的多边合作进行研究。第三，将其视为集体研究议程，属于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议程。王磊认为，金砖国家研究应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

金砖国家（BRICS）的概念由英国学者吉姆·奥尼尔于 2001 年提出，最初是用于投资、贸易和实业界的数据分析，偏重应用。2001 年开始，许多领域的学者开始研究五国的贸易结构、经济和产业投资，这一概念正式形成。此后，金砖五国政府间政治合作的正式起步，对这一区域合作机制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确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四大平台之一，并于 2017 年主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金砖国家研究界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中国学者也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支持。

目前中国金砖国家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金砖国家研究主要学术机构以北京为中心，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直接冠以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或研究院的名称，另一类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则侧重新兴经济体或新兴

市场的研究。第二，学术和政策两种风格的金砖国家研究形成联动，相关研究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政府部门的决策需求，政策研究占很大比重。第三，金砖国家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议题首先是全球治理，其次是国际机制，研究重点关注金砖国家合作的属性本身。

中国的金砖国家研究之所以取得一定成果，首先是充分借助了外部政治推动和政府政策需求，确保了研究能快速起步；其次是精准的学科定位，突出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特点，以全球治理为框架；第三是注重研究机构和团队的建设；此外，这项研究还具有天生的国际化属性。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高级协调研究员 Hany Besada 关注的议题是全球卫生治理与南南合作。他表示，全球卫生治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各方应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注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时建立三角合作模式，即一个发达和两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合作，共同发展。同时他希望能将南南合作的机制运用到非洲的发展中，确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发展。

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是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重要的一部分，目前一些国家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在该领域成为典范。比如古巴奉行卫生国际主义政策，努力推动不同收入群体的国家间开展合作。古巴培训国际医生，为非洲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帮助。60 年以来古巴 3 万多名医生在 100 多个国家提供卫生服务，进行了上百万例手术，对 5 万多名发展中国家的医学生进行指导。

国际主义是全球趋势，并将促进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合

作。古巴有全球最大的医学院，坚持医疗国际主义 60 多年，这一方面有利于其将医疗资本转换为商业价值资本，另一方面也使自身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通过软实力在非洲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与古巴一样，中国定期派出医疗队前往非洲帮助当地民众。过去五年，中国对外医疗人数增长了十倍。中国不仅给非洲送出了很多优秀的医生，同时也送出了很多药品、医疗设备，这都是非洲很需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也引起了争议，很多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种种行为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对此 Besada 认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金属、石油等的确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这种互利互惠的发展模式值得肯定，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纯粹的人道主义，应该肯定利他主义有其特殊的价值。

Besada 强调，全球应认识到南南国家之间团结的重要性，有必要建立三方合作机制，同时应加强南北之间的合作，促进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

柬埔寨皇家翰林院中国研究院院长 Sereyvath KY 分析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柬埔寨合作的前景。他表示，中柬两国于 2011 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际，柬埔寨认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本国的心声，而“一带一路”则表达了与柬方相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期待。

中柬合作的成果首先体现在贸易方面。2017 年柬埔寨对外贸易总额为 250 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额达 60 多亿美元。中国输送了很多产品到柬埔寨，但同时柬对外出口增

长率更大，柬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获益良多。其次体现在FDI 方面。2017 年在柬 FDI 总额中，中国投资占比超过 40%，虽然增幅不大，但与西方国家投资减少相比，中柬合作的趋势越来越强劲。在经济特区方面，柬埔寨目前有 5 个与中国合作建设的经济特区，它们为柬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特别是纺织业。经济特区能够帮助柬埔寨提升制造业水平，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地区。此外，中柬在金融领域也有很多合作，人民币在柬和美元地位一样，可以直接用于支付，银行和大公司也都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中柬银行业间的合作为柬供了很多融资机会，获得了稳定的来自中国的资金流。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已经对柬埔寨有了很深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柬埔寨旅游，当地很多小摊贩都会说中文。孔子学院在柬埔寨的开设，也让更多柬埔寨人有机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Sereyvath KY 认为，未来中柬合作的潜在风险主要有几点：柬埔寨 EBA 待遇有可能被取消，从而影响中国在柬投资；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对柬实施经济制裁，会间接影响到中柬合作；中国在柬开展项目合作时面临的环境问题。总体上看，中柬合作既有潜力又有挑战，今后双方要在多个领域共同努力，提升合作的质量。一是要加强教育合作；二是要坚持法治原则；三是要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废弃物回收技术；四是重点关注农业部门的合作；五是继续推动中柬经济走廊的建设。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旭以南亚为例，探讨了“一带一路”机遇下的地区研究与非通用语言人才培养。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非通用语言人才的需求，特别是那些了解相关地区和国家的人才的需求迅速提升，也给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首先，非通用语种是了解区域研究中对象国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而不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主导的平台。因此与沿线国家的沟通合作，寻求共同利益，建立相互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中国关注沿线国家的各方面发展，加强人文交流。此外，由于在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对接的大多是微观企业，所以需要培养更多能够掌握具体知识的人才。

其次，大学智库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培养学生的目标是拥有扎实的知识基础，进行长期的实地工作，密切关注目标国家。目前国内智库有三种类型：传统智库，社会智库和大学中的区域研究智库。大学智库获取政府信息的效率较低，且相对缺少人力和资金资源，但另一方面，大学智库可以利用跨学科资源，将政策咨询做得很深入，不仅仅局限于政策推荐。

第三，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相比，非通用语言专业的研究人员在地区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果不会当地语言，那么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取一手材料，不可能真正了解国家发展的前沿状况。另外，只有在与当地人的实际交流中，研究人员才能够真正全面地了解对象国的宗教、历史和文化，进而才能让当地民众接受相关倡议。

王旭认为，相较于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的人才，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在于长期地关注某一特定国家，而前者大多更

注重理论，即使研究特定国家，也只是短期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语种人才和社会科学人才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补的关系。

六、区域聚焦：东南亚与中东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首先介绍了中国中东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中东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中国受到来自世界上两个阵营的封锁，毛泽东主席于 1961 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阐述了世界上两个集团之间存在一个广泛的中间地带，主要由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国家组成。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开始建立亚非拉研究，这是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开端。

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使得中国对了解世界的需求大大增强。由于没有研究人员，商务出版社发起了翻译运动，组织全国学者翻译了世界各国地理和历史两套丛书，这对中国认识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未来中国中东研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研究实现大规模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二是科研成果丰硕，除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一批与中东有关的百科全书得以出版。三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过去只是聚焦于中东政治、宗教、历史、文学研究，现在已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四是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果。上世纪 80 年代前，中国没有研究中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全国已经有几百名专门研究中东方向的博

士生。五是中东研究在中国智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最后是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在外国发表论文数量增加。

杨光指出，目前国内中东研究面临的挑战有四个方面。第一，学科体系建设与国际先进相比存在差距，学科结构不合理，研究能力整体薄弱。第二，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存在缺陷，国内采用实证的方法较多，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难以形成中国研究的特点。第三，学术研究传播存在问题，国内的研究成果很少为国际学术界所知。最后，虽然研究团队数量有所增加，但如何协调学科发展和智库研究之间的关系仍是问题。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人文研究学院教授 Keiko Sakurai 介绍了早稻田大学的伊斯兰区域研究发展情况。她指出，伊斯兰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具有三个鲜明特点。首先，它涵盖了穆斯林存在的社区，无论他们占多数还是少数。其次，它鼓励具有不同研究背景和专业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第三，它促进伊斯兰地区内外学者的国际合作研究。伊斯兰研究的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区域的经验性知识体系。其次，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出发加深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地区的认识。第三，通过伊斯兰地区内外学者间的学术对话与合作，公平公正地了解该地区的多样性和动态。

伊斯兰地区研究与欧洲曾经出现的东方研究不同，后者倾向于将“东方”过分简化为“西方”的对立面，而伊斯兰研究则是通过国际联合研究，从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地区的内

部与外部视角观察这个地区。同样，伊斯兰研究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非殖民化国家战略研究中产生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现有的国家和地理区域，而伊斯兰研究则不限于此，许多研究集中在现代伊斯兰地区的跨境互动，强调对信仰和实践伊斯兰教的人的生活进行深入、全面的理解，鼓励与人文科学研究相结合。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教育部(MEXT)和日本国立人文学院(NIHU)联合了东京大学、上智大学、京都大学、东方图书馆和早稻田大学 5 个主要学术机构，建立伊斯兰地区研究网络。其中，早稻田大学以“伊斯兰文明与知识”为主题，组织研究小组对伊斯兰思想进行文本分析，探索伊斯兰思想在不同语境中的实践。

在研究成果方面，早稻田大学用日语和英语发表相关研究报告；将经典和当代文本的注释翻译成日语；出版了 24 卷《了解伊斯兰教》丛书，帮助本科生理解伊斯兰教的各种话题；出版英文的《伊斯兰地区研究丛书》，并为伊斯兰区域研究组织每年出版的《伊斯兰区域研究杂志》提供学术成果。在研究方法上，鼓励学者进行多学科交叉，特别是与人文学科相结合。例如，利用 GIS 增加自然环境长期变化的视角，克服基于政治和王朝变化的历史分期；结合考古学、文本和化学分析，研究中世纪陶器，揭示技术创新在特定时期出现的原因和方式。

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 Mahmoud Al-Batal 分析了阿拉伯语和中东地区研究的现状和挑战。

目前全球对阿拉伯语的学习需求正不断提升。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学习阿拉伯语的人数超过 4400 人，当时很多人都关注阿拉伯语的语法学习，却忽略了阿拉伯语的文化内涵，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高级水准。至 2013 年，学习阿拉伯语的美国人已经超过 3.2 万，且近年来人数持续增长。

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促使美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因素主要有日常交流、旅行需要及政治对话三种。学习阿拉伯语的多数是本科生，分布在各个专业，大部分人将其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用它来帮助专业知识的学习。现在，不少教阿拉伯语的老师不再是母语者，他们具备很高的阿拉伯语水平，这有助于打破阿拉伯语的非母语者学习现状，即不只是母语使用者能够教阿拉伯语，更多非阿拉伯语母语者也可以做到。

Al-Batal 指出，除了现代的标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中也有很多方言，在很多交流环境中，大家讲的都是阿拉伯语方言，但这些方言无法便于大范围交流，如果想与更多阿拉伯人交流就必须学习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此外，对阿拉伯语的学习也有不同的标准。学术中主要使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而在不同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学习的是本地语言。这种情况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想要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他应该去不同的地方，学习不同的方言。阿拉伯语的学习应该是多元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宇的发言主题是《从宗教党派参政看以色列多党制度的得失》。

据介绍，以色列主要的宗教党派有以色列正教党、圣经旗帜党、沙斯党、亚哈德党和国家宗教党。他们共同的政治诉求是在宗教层面和民族层面保持、加强以色列国家的犹太

性。

以色列议会由 120 个席位组成，选举前每个党派都要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一个 120 人的名单，其成员可以由多党派组成。选举中，民众为党派而非具体人员投票，某一党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是根据它得到票数的百分比确定的，同时只有达到得票数门槛线的党派才有资格进入议会。获胜的党派必须组建一个超过 61 席的联盟来领导政府，否则得票数第二的党派将有机会组建联盟。1949 年至 1996 年，宗教党派在每次选举中平均取得 13-18 席，1996 年后为 20-27 席，因此，宗教党派的席位非常重要。而 1948 年后，以色列政府联盟中至少有一个宗教党派。

然而，宗教党派作为政治盟友却不可靠，以色列多任政府都是因为宗教党派发难而提前垮台。本-古里安执政时期，宗教党派因宗教教育问题通过不信任案，最终导致本-古里安辞职；1952 年，宗教党派因女性服兵役问题退出政府联盟，导致政府再次垮台。1952 年第二届政府重组之后，本-古里安厌恶为组阁讨价还价，他认为这是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历史中没有参与国家责任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在第三届政府中他试图改革选举制度，但由于少数党派拥有否决权，这一改革未能实现。本-古里安最终引退。1976 年，宗教党派因拉宾政府在安息日开始后仍使用飞机等交通工具而提出不信任案，最终该议案的通过导致了政府垮台。

不过，宗教党派退出执政联盟政府却没有垮台的情况也出现过。1993 年沙斯党因巴勒斯坦和谈问题退出联盟，但拉宾政府在阿拉伯党派的支持下继续存活。2004 年，宗教党派

因加沙问题退出沙龙政府，但沙龙政府在反对派工党的支持下得以存活。2012 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因反对派的加入度过了宗教政党退出的危机。但这种“幸运”的政府并不多见，且往往是面临影响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决策时，政府才能破例得到反对党的支持，在常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承受宗教党退阁的打击的。

王宇认为，宗教党派参政体现出以色列多党制的弊端：很难组成执政联盟；联盟的政策由政治家而非专业人员讨论得出，有些政策长期而言对国家未必有益；政治家讨价还价的内容都是国家资源，导致国家资源分配不公；政府极度不稳定，导致政策无法延续。

以色列海法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Sammy Smooha 认为，在区域研究中，以色列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研究案例。他表示，非伊斯兰国家的研究者在研究以色列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全球性的视角看待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以色列。另外，对于以色列或中以关系的研究，必须理解战略性和非战略性两个部分，同时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美以关系等问题也是难以避开的话题。

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位于中东，具有重要的地缘位置和宗教影响，可以说以色列的稳定关乎中东的稳定。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时是一个民族国家，这反映出一种共生的状态。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以色列或许只能算是中等大小的国家，但它的经济实力却不弱。以色列的国民收入位居全球前列，科技研发投入比很高，拥有很多全球顶尖院校。以色列是中东的一部分，也是地中海的一部

分，受地中海文化的影响，将东西文化连接起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主要是巴以冲突和加沙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周边国家也受到这一冲突的影响。尽管受到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抵制，但以色列仍是一个强健的国家，对于以色列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

美国是以色列重要的支持国，但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也不错。因此，以色列面临的困境包括两点：如何区别投资是战略性的或是非战略性的；如何在不惹恼美国的前提下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以色列于 1992 年和中国建交，现在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公司在以色列开展了很多业务，比如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中以双边保持良好关系，对周边国家也会有很大帮助。因此，如果研究以色列，就不应只关注以色列本身，还要对周边国家有所了解。

有观点认为中国对以色列的影响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对以进行了很多战略性投资，这种投资虽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国家安全也会有危险。为此，以色列国内有声音指出有必要谨慎地对待中以关系，另外也有人担心中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是中国的朋友，这也是以色列面临的挑战。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Yoko Hayami 的发言主题是多边以及跨学科的东南亚研究。她表示，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是基于多学科设置的理论驱动学科，提倡非区域语境下的实证研究，任务是进行全面多学科的研究，关注区域和

人类发展。

东南亚研究演进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60-70 年代是机构发展阶段，主要是进行国别或专题基础研究以了解该区域；20 世纪 80 年代是联合研究发展阶段，进一步了解东南亚区域各方面情况；新旧世纪之交进入综合区域研究发展阶段，开始实施 COE 计划。早期研究主题包括农业生产、政治组织与政府程序、教育、语言、经济发展、宗教等；20 世纪 80 年代的多学科主题包括热带季风生态系统中的农业发展、经济发展与小规模世袭国家的社会基础等；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重新思考“区域”和“区域研究”的关系。

21 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社会发展出现很多新变化也产生很多新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东南亚研究、东盟研究感兴趣，学者的工作重点也发生变化：从地区本身出发，视野放宽至世界，形成人类生物圈的共存意识和全球意识等。

涉及生存圈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有热带生态和老龄化社会与护理问题。人类农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量雨林被砍伐变成耕地，导致了大面积森林火灾，一味关注生产率的后果是大规模的环境破坏，生态问题接连导致了一系列贫困。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技术和生存圈驱动技术核心不同，后者关注碳累计和生物智能，注重保护环境，该研究也受到了国内外很多学者和机构的关注与支持。

老年人关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对国家形成较大负担，对老年人的关怀有利于社会稳定。日本和泰国对老年人护理的“四边钻石形结构”（国家、市场、群体、家庭）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国

家、市场、家庭等力量较强，而泰国市场力量薄弱，护理主要以家庭为主，但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造成差异的原因是老龄化的日本在工业革命后发展迅速，导致群体社区薄弱，而泰国则是工业化与人口变化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同步发展。

Yoko Hayami 认为，过去的东南亚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奉行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主义，属于基于学科领域的研究。现在的东南亚研究以了解东南亚区域的全球问题和本区域紧迫的现实情况为重点，主张多边学院派，热衷于更广泛的多学科领域研究和与各部门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加强东南亚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决东南亚面临的问题，也能为全球多元共存和可持续的生存圈提供解决方案。

印度尼西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 Cahyo Pamungkas 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区域研究从国别研究到跨国流动研究的发展历程。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有 200 多个民族及数万个岛屿，内部存在很多冲突。外国学者从殖民时期就开始对印尼社会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可以说印尼一直是在接受他人的定义。实际上，印尼也想借鉴西方的学说进行区域研究，从而定义自己。为了弥补知识间的鸿沟，1998 年印尼科学部成立了东南亚研究项目，着力于社会科学研究，开创了区域研究部门。2001 年该项目发展为地区资源研究中心，2019 年又改名为区域研究中心，涉及政治、历史等话题。中心关于各个国家的研究是独立的，区域研究的重点也因大学而异，主要议题包括亚洲、非洲和西欧的全球与地区互动

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渊源可追溯至 1778 年巴塔维亚

艺术科学研究院的建立。1864 年和 1898 年法国陆续成立了两个机构以研究越南、老挝和高棉地区的社会与文化，1917 年英国成立了研究印度、缅甸、东方和非洲事务的机构，1971 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ISEAS），1973 年越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立。目前，有很多新的社会因素推动着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比如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东南亚与全球的互动，以及东南亚加入全球供应链网络的进程等。

Pamungkas 表示，未来 5 年，印尼域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社会的影响：边境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形成；东南亚的水稻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网络；荷兰的印度尼西亚食物：再制文化网络和殖民记忆；智能弹性城市：亚洲和欧洲的城市规划网络等。他指出，印度尼西亚的区域研究更关注学术而非政治利益，研究对象从关注一个国家的研究转向关注跨国运动，研究内容从关注地区和全球的互动到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网络的构建。区域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发展跨学科方式和多点民族志研究方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